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国家篇 法律篇

〔古罗马〕西塞罗 著



275

003

21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国家篇 法律篇

[古罗马] 西塞罗 著

沈叔平 苏力 译



A0970426

商务印书馆

200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篇;法律篇/(古罗马)西塞罗著;沈叔平,苏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ISBN 7-100-03442-6

I. ①国…②法… II. ①西…②沈… ③苏… III. ①西塞罗,
M. T. (前 106~前 43)—哲学思想②国家理论③法的理论
IV. B50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253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国家篇 法律篇

[古罗马]西塞罗 著

沈叔平 苏力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442-6/D·295

1999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2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张 8 5/8

定价: 15.00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译者前言

就了解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源流来说,西塞罗的《国家篇》和《法律篇》这两部著作早就该翻译了。然而,只是到了20世纪末,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稳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才得以完成。这其中的意蕴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但这至少表明了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有一种比学术自身的价值更为紧要的关系。

而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以及他的这两部著作在西方政治法律史上的价值可以说就是上述命题的另一个证据。今天,几乎所有的政治法律学说史家都不认为这位古罗马时期的思想家对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统有什么独到的重大贡献,但是又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政治法律思想史的著作都不能不提到西塞罗。他在西方思想史中占据了一个他人无法替代的地位。这就是因为,他几乎是从古希腊时期到欧洲进入中世纪这一历史时期唯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人物。他并不是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但由于他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对当时的各派希腊哲学学说作了详细解释,因此是希腊文化的传承人;他将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发扬光大,就其目的而言是为当时的罗马共和制服务,但这种思想经过他以及受其影响的罗马法学家的的发展,客观上却是为他身后即将出现的罗马帝国奠定了一种政治法律哲学基础;他又

是一位政治家,曾经以最低的法定年龄出任罗马共和国的最高职务执政官,并一直担任重要职务,而且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权力角逐中几度沉浮(最终遭杀害),这种经历使他具有通常的学者所不具有的政治观察力和务实的精神。所有这些,构成了西塞罗的独特魅力,构成了他在西方政治法律史中无法回避的地位。他有不少著作,而最能反映他的政治思想的,同时也最为人们重视的,就是我们翻译的《国家篇》和《法律篇》。

对于西塞罗的思想,我们不打算在此作一番常见于许多有关著作中的系统概述。我们想特别指出的是,根据这两部著作,我们应当重新对西塞罗的通常评价作出某种修正或补充。通常的评价认为西塞罗强调理性。他的著作中的确有不少关于理性的论述,认为最好的国家和法律可能是某个缔造者个人智慧的产物。但是从这两部著作中,我们还看到常常被人们忽视或淡化的一面:他对历史和习俗的尊重,他作为政治家的务实和机智。例如,他表示对自己的关于自然法的评论并无把握,要求批评他的人不要深究;他认为理性同传统是相结合的,认为在罗马共和国得以长期坚持的惯例、法律制度就是理性的体现。这实际上是拒绝了个人的理性,而将理性同一个民族的长时期的实践结合起来了。他对宗教法(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的“礼”)给予更多的重视,将其列为首要的法律(见《法律篇》第二卷),即使其中有些宗教法存在的先前的理由已经无法成立,他仍然坚持,只要这种宗教法事实上已经衍生出了不为人所意识的且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功用。因此,他明确表示他不是翻译前人的论证,而是要给予他自己的理解和论证,而这种论证又总是带有他作为务实政治家的特征。例如,他认为宗教法

的作用更多是对这个民族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力,对个人有一种精神的净化和升华的作用。这种说法表明他认为一个民族仅有理性是不够的,而需要一种“虚幻的”情感因素;这种观点后来在卢梭那里得到深入的发展和阐述。他禁止向神敬献土地和贵重的财物;尽管他说了许多理由,这些理由在今天看来颇为荒谬,但他最终的理由是,担心耕地减少,担心人们会为“贿赂”神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又如,他对有关葬礼作了相当细致的规定,而在这些宗教法规定的背后,都是关于节省土地、防止奢华排场、防止因财富不均引起阶级对立、甚至防止火灾这样极为具体的实际考虑。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他的务实,表现了对于传统礼俗的政治家的眼光,而并不拘泥于规则、文字和信条。而所有这些都,都是我们在翻译西塞罗之前未意想不到、也未能充分领略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西塞罗关于理性、正义、自然法的论述,也许应当给予重新的考虑。我们也许应当将之作为一种支持他具体政治主张的修辞——要知道西塞罗也是古罗马时期最著名的雄辩家和律师之一——而未必是他的确信。并且因此,以往的学者关于西塞罗缺乏独创性、缺乏思想的一贯性之类的评论既是事实,又不是事实。如果仅仅从其思想在西方思想源流中的贡献和其思想的逻辑体系来说,这种评价是公允的;但如果从西塞罗的一生及其所面临的问题——一位政治活动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不是脱离直接政治活动的思想家所思考的问题——来看,这种独创性之缺乏是与他的务实相联系的,是他首先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之必需,他的思想不一贯恰恰体现出的是一种实践上的一贯。因此,历史不是一堆固定的材料,许多史学家的盖棺定论也并不一定恰

当或精当,历史材料可以在新的背景和思路下作出新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不会有终结。

也正因此,翻译 2000 多年以前这位古罗马人的著作才可能具有超越其文本自身的意义。也正因此,我们才在翻译时,并没有感到是在同一位完全的陌生人例行公事,而是小心翼翼地试图与他沟通,试图理解他,同时也是理解自己和他人。

西塞罗原作为拉丁文,我们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依据的是《洛布经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的译本,英译者是克林顿·沃克·凯斯(Clinton Walker Keyes)。此书的翻译始于 1993 年初,由沈叔平统筹安排了这一选题。为统一译名,苏力首先翻译了有关的人名地名索引,沈叔平翻译了《国家篇》,苏力翻译了《法律篇》,最后由苏力对两篇译文作了全面校订。由于种种限制,翻译难免错误,还请读者方家指正。

译者

1997 年元月 15 日于北大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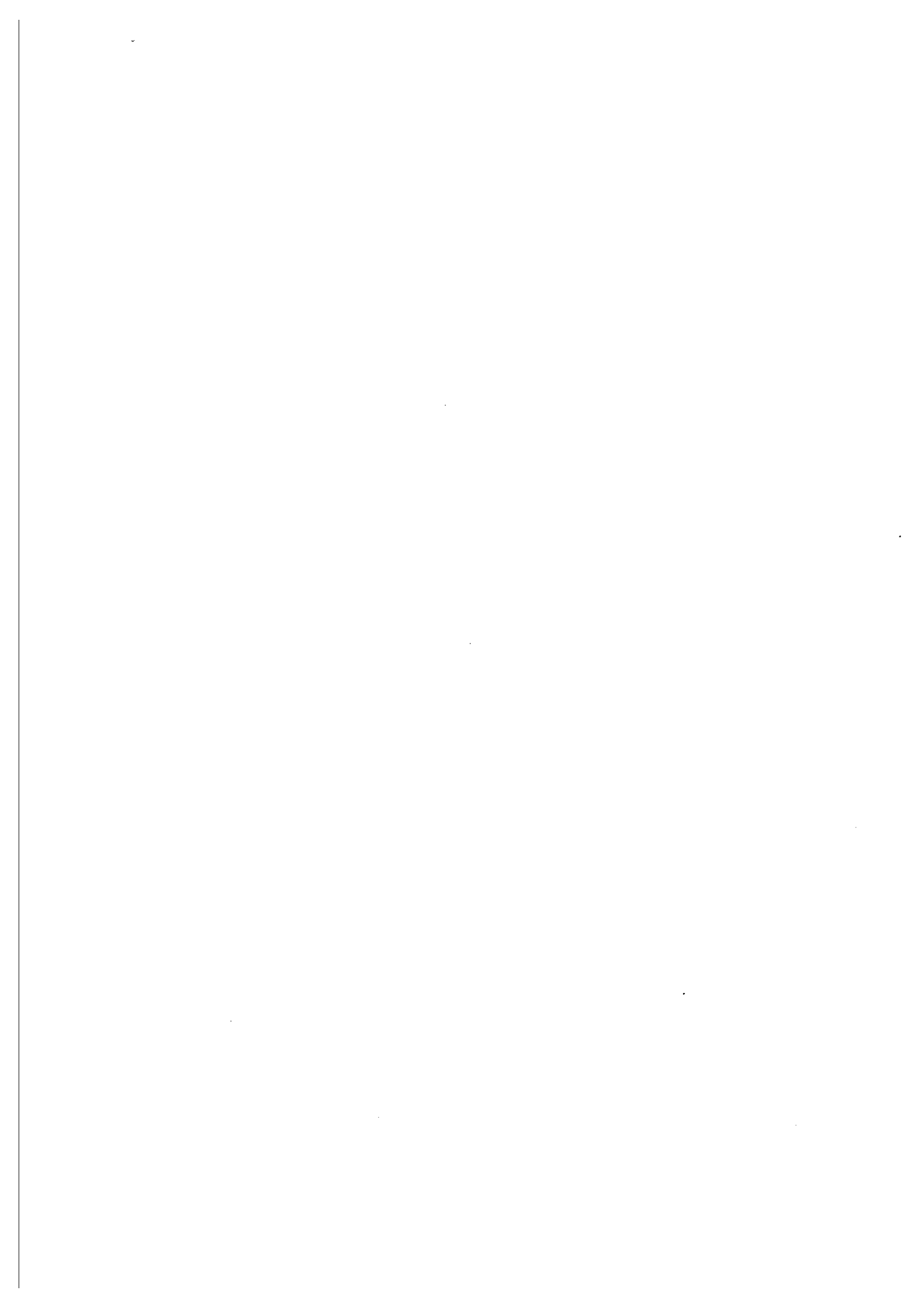
国 家 篇

英译本导言	(3)
第一卷	(11)
第二卷	(56)
第三卷	(91)
第四卷	(113)
第五卷	(119)
第六卷	(124)
未能确定其位置的残篇	(138)

法 律 篇

英译本导言	(143)
第一卷	(148)
第二卷	(182)
第三卷	(223)
残篇	(251)
专有名词索引	(252)

国 家 篇



英译本导言

公元前44年,西塞罗说“当他正为国家掌舵”^①时他已经写完了《国家篇》。他的话仅仅在相对的意义上是真的。对西塞罗说来,似乎后来的一段时期,即自公元前57年他被放逐归来至公元前49年内战爆发的那一段时期,才是他进行国务活动的时期。但是,正是国家的“舵”转移到更为强有力的第一次三头同盟之手(前59年),^②才使得西塞罗有余暇追随他敬爱的柏拉图的足迹去写第二本《国家篇》。

公元前54年(很可能是5月),《国家篇》的写作才真正开始。^③可是,西塞罗发现此书很难写,所以这项工作由于写作计划的多次变动而耽搁了。公元前54年10月,他写完两卷并计划再写七卷,每一卷容纳一天的谈话。谈话的人将是小阿非利加努斯、莱利乌斯以及他们的几位朋友。可是,当西塞罗向朋友戈内乌斯·塞拉斯蒂乌斯诵读上述二卷全文时,他被告知,如果以他本人的身

① *Sex de re publica, quas tum scripsimus cum gubernacula rei publicae tenebamus. De Divin.* II, 3. ——英译者,以下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同。

② 指凯撒、庞培与克拉苏三人的政治联盟。——中译者

③ *Ep. ad Quintum Fr.* II, 12, 1; III, 5, 1—2. 根据前注所引文字,看来不能必然认定这一著作的第一稿完成于西塞罗任执政期间(公元前63年)或在此后不久。这是J.P.理查兹的观点(*De politicorum Ciceronis librorum tempore natali*, Wuerzburg, 1829, p. 9)。

分,而不是通过一位先前的政治家之口,来叙述他对国家事务的看法,那么文章会生动得多。这个建议为西塞罗所采纳,他把书中的对话人改为他的兄弟昆图斯和他本人。可是后来他仍按原计划写成此书,只是把那些虚构的谈话缩短为三天,全书六卷,每一天的谈话分别写成两卷。^① 我们无法了解此书写成的准确日期。阿提库斯似乎在公元前 51 年曾第一次读过此书,^②凯利乌斯·鲁夫斯在同年也曾提及此书广为流行。^③

此书是献给西塞罗年轻时的友人的,这位友人说他曾经在士麦那从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夫斯那里听到这一全部对话的报告;从此迹象看,此人有可能是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④

这个对话假定发生于普布利乌斯·利内利乌斯·小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的花园,时间为公元前 129 年拉丁假日间。在场的人为西庇阿、盖尤斯·莱利乌斯、露西·菲卢斯、曼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昆图斯·埃厄利乌斯·图伯罗、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夫斯、斯普里乌斯·穆米乌斯、盖尤斯·范尼乌斯和昆图斯·穆西乌斯·斯凯沃拉。^⑤ 每一天谈话开始之前(即在第 1、3 和 5 卷之前)西塞罗自己都有一个前言。

由于此书现已残缺不全,下面为读者列出此书内容的大纲。^⑥

① 《国家篇》II, 70; VI, 8; *De Amicit*, 14。

② *Ep. ad Att.* V, 12, 2。

③ *Tui politici libri omnibus vigent*, *Ep. ad Fam.* VII, 1, 4。

④ 《国家篇》I, 13。参见 R. Hirzel, *Der Dialog*, Leipzig, 1895, I, p. 469, 注 2。

⑤ 《国家篇》I, 14。关于这些人物的简介,见本书索引。西塞罗之所以将对话置于昔日,因为他担心会触犯什么人(*Ep. ad Quintum Fr.* III, 5, 2)。

⑥ 如果想知道更为完整的提纲请看 T. Petersson, *Cicero: A Biography*, Berkeley, Cal., 1920 年,第 445—451 页和第 457—461 页。

第 一 天

第 一 卷

第 1—12 节^①,西塞罗的前言:为政治家的生活辩护。

第 13—14 节,进入对话的过渡。

第 15—34 节,初步对话:关于“两个太阳”;天文学概论,阿基米德的天球仪;日蚀;研究天体与大地的各自意义;话题转入国家问题;要求西庇阿谈谈他关于最佳政体的观点。

第 35—71 节,几句开场白之后,西庇阿界定了国家,并开始讨论下述题目:三种简单的良好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它们向各自相应的坏形式蜕化的趋向;拥护和反对这三种简单政体的各自论证;它们蜕化的具体过程;均衡政体是这三种简单形式的混合体;它的稳定性;它的理想特征;罗马作为这种政体生动范例。然后,他表明有意在以后的讨论中以罗马共和政体作为他理想国家的类型。

第 二 卷

第 1—63 节,按照这一意图,他简略地追寻了罗马国家出现以来的历史。

第 64—70 节,他从罗马的历史中概括出一些结论,支持他讨

^① 这里所说的节,即本书边码所标示的段落。下同。——中译者

论过的政体；此后，他谈及理想的政治家以及在各国支持正义的必要性。

第二天

第三卷^①

第3—7节，西塞罗的前言：人性；人类理性；从实践型政治家才能中发现人类理性的卓越作用，实践型政治家优于仅仅关注政治理论的人；因此，强调实践的罗马人被置于强调理论的希腊人之上；探究正义的基础。

第8—28节，对话转到拥护与反对各国内的正义两派之间的争论。菲卢斯，违背他的信念，提出卡涅阿德斯(Cameades)的赞同政府必定不正义的论点。

第32—41节，莱利乌斯为正义辩护，认为在一国家中必须有正义。

第42—48节，西庇阿用实例说明，任何正义的政府便是好的政府，而没有正义，无论什么形式的政府都必然是坏政府；事实上，没有什么政府可以不依赖于正义而存在——如果它还值得被称为国家的话。

^① 参见圣奥古斯丁对此书内容的概括(*De Civ. Dei* II, 21)。

第 四 卷

只有片断残存。公民的社会分类,保持道德高标准,青年教育,以及戏剧的影响,这些都明显地是讨论的题目。

第 三 天

第 五 卷

这一卷几乎全部遗失。开始为前言(第 1—2 节),西塞罗谈论古代时兴的德行。这一对话似乎讨论了法律与法律执行,以及理想的政治家。^①

第 六 卷

本卷讨论了政治家辛劳的巨大价值以及崇高回报,最后以西庇阿的梦结束。这个梦使讨论的主题超越了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短暂易逝的生命,进而融化于整个宇宙与永恒之中。

^① 关于西塞罗的理想政治家,见 T. Zieliński, *Cicero im Wandel der Jahrhunderte*, 第 3 版,柏林,1912 年,第 5 和 151 页;R. Beitzstein, *Die Idee des Principats bei Cicero und Augustus*, *Nachrichten der Gött. Ges. der Wiss.*, 1917 年,399 页以下,436 页以下;R. Heinze, *Ciceros "Staat" als politische Tendenzschrift*, *Hermes*, 59(1924 年),第 73—94 页;E. Meyer, *Cäsars Monarchie u. das Prinzipat des Pompeius*, Stuttgart, 1918, 176 页以下。

渊 源

西塞罗的《国家篇》得益于柏拉图,这显然是巨大的。^① 西塞罗有意写这样的一本著作,很明显是他读了柏拉图的《国家篇》^②而产生的,此书的形式和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受柏拉图同名著作的影响。下面指出一些明显模仿的地方:对话过程中出现的人物相当多,而实际参加谈话的却限于几个人;一个神圣节日而带来的闲暇为这一对话提供了机会;对话从远离国家这个问题的一些题目开始;关于正义与非正义争辩的引入,以及政体、理想政治家、教育和戏剧的影响之争辩的引入;最后,对话描述了一个神秘性的体验,把读者带到现实生活范围之外。漫长的专题论述不时被打断,是为了保持对话的特点。此外,主要谈话人西庇阿,也像苏格拉底那样,拒绝扮演其他参加对话的人的老师,^③ 这一点也值得一提。

也许,在公元前 54 年的政治背景下阅读柏拉图的《斐德若篇》对西塞罗也有某些细微的影响。例如,此书可能提示,把这一对话置于主要谈话人的晚年生活,并提示读者集中关注死后的生活——这一对话的高潮。^④ 此外,西庇阿关于君主政体优于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的命题,与柏拉图的《国家篇》也非常相近。^⑤

① 参见 R. Hirzel, 前引著作, I, 463 页之后。

② *Republic*, 中译本通常译为《理想国》。——中译者

③ 《国家篇》I, 70。

④ 见 R. Hirzel, 前引著作, 第 467 页, 注 3。

⑤ 《国家篇》I, 56—64; 柏拉图,《政治家》, 302E。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古希腊作者著作的其他较小借用, 见有关的注。

关于书中对话内容的主要来源,西塞罗本人也给了我们一点提示,他提到西庇阿曾经常与帕奈提奥斯讨论国家这个题目,波利比阿斯也在场。^①事实上看来很有可能,卷1至卷3中的哲学和政治理论来自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帕奈提奥斯,而在历史资料及实际政治问题上,很大部分可能是借用了波利比阿斯的观点。^②“西庇阿之梦”的一般来源如何,这是一个猜测的问题,人们提出了各种说法,但没有一种获得普遍的认可。^③

西塞罗感到《国家篇》的写作是一件慢且难的工作,^④把希腊的观念移到拉丁时代并非易事,不像他后来写作哲学著作时那样容易。^⑤除《法律篇》可能是一个例外,《国家篇》是他著作中最具独创性的,如果本书全文得以保存,我们将毫无疑问地发现它是西塞罗全部著作中最为辉煌和引人入胜的,与该书的崇高结论十分相配。

① 《国家篇》I,34。

② 见 Polybius, Book VI. 关于帕奈提奥斯和波利比阿斯是西塞罗思想渊源,见 A. Schmekel, *Die Philosophie der mittleren Stoa*, 柏林, 1892 年, 第 47—85 页; R. J. Schubert, *Quos Cicero in libro I et II de re publica auctores secutus esse videatur*, Diss., Wuerzburg, 1883 年; C. Hintze, *Quos scriptores graecos Cicero in libris de re publica componendis adhibuerit*, Diss., Halle, 1900 年; R. Hirzel, 前引著作, I, 464 页以下。有关西塞罗学术的渊源问题的彻底讨论,见 Ioh. Galbiatus (= G. Galbiati), *De fontibus M. Tullii Ciceronis librorum qui manserunt de re publica et de legibus quaestiones*, Milan, 1916 年。

③ 有关这一问题的参看文献,见 M. Schanz, *Geschichte der römischen Litteratur* (Mueller 的 *Handbuch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一书的第 8 卷), 第 3 版, Munich, 1909 年, I, II, 第 345 页。但无论如何,看来都可以肯定西塞罗运用了一些或更多的“哲学规劝”,这是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哲学家构建的。(关于西塞罗自己的“规劝”,即 *Hortensius*, 只留下一些残篇。)

④ *Ep. ad Quintum Fr.* II, 12, 1.

⑤ *Ep. ad Att.* X II, 52, 2.

手稿

《国家篇》一书,除了“西庇阿之梦”一段及后来的作家零散引用的段句外,一直遗失不知去向。1820年卡迪纳尔·安吉洛·梅——当时他是梵蒂冈图书馆的馆长——在一个书录圣·阿奎那评论赞美诗的古板上,发现了此书残篇,大约为原书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这个梵蒂冈手抄本 5757(V)号的年代是公元五世纪或六世纪。^①

“西庇阿之梦”保留于西塞罗的手稿之中,也保留于麦克罗比斯的手稿中,后者为它写了一篇注释。本版书中的文本注释所提到的“西庇阿之梦”手稿,来自下列出版物(从略)。

^① 这一手稿已经为第二次抄写所改动,关于第一稿和第二稿(即 V1 和 V2)各自的价值,人们意见很不一致。关于这一争论的有关文献以及对《国家篇》一般性文本批评的文献,见 C. Pascal 版,载于 *Corpus Paravianum*, Turin, 1916 年, G. Galbiati 作序,第 viii 页和注 2; 第 ix 页,注 2; 又见 K. Ziegler 版, Teubner, Leipzig, 1915 年, *Praefatio*。

第一卷

在此版本中,开头的部分大约有十页,已经遗失。我们的手稿是从西塞罗为此对话所作的前言中间开始的;在这里,他显然极力反对伊壁鸠鲁学派对爱国主义和一个政治家的生活的敌意。

一、[没有积极的爱国主义]^① ……[就从来也不]可能把我们的[祖国]从敌人的进攻中解救出来;盖尤斯·杜依利乌斯、奥卢斯·阿蒂利乌斯或卢修斯·梅特卢斯^② 也不可能使[罗马]免除对迦太基人的恐惧;那两位西庇阿^③ 也无法以他们的热血扑灭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熊熊战火;当这种爱国主义以更大的愤怒再次喷发时,昆图斯·马克西姆^④ 也不能减少它的重要性,马库斯·马塞卢斯^⑤ 也不能将之粉碎;普布利乌斯·埃米利安努斯也无法将之与这个城市分离,无法将之约束于敌人的城墙之内。

还有马库斯·加图,这位曾出身低微、默默无闻^⑥ 的人——由于他为我们树立了仿效的样板,我们所有献身同样追求的人都获

① 为保证残篇意义通顺,猜测恢复的文字置于[]括号之内。

② 正文中所提到的这些人以及其他,请参看本书索引。

③ 普布利乌斯·科内利乌斯·西庇阿(公元前 218 年任执政官)以及他的兄弟格奈厄斯·科内利乌斯·西庇阿·卡尔沃斯(公元前 222 年任执政官)。

④ 昆图斯·费边·马克西姆。

⑤ 即普波利乌斯·科内利乌斯·小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

⑥ 原文 *novus homo*,指的是他是其家庭中第一个获得高职的人。

取了勤奋和勇敢——很可能就在离罗马很近的图斯库卢姆住下去了,在这个有益健康的地方,享受他悠闲的生活。可是,他这位被我们某些朋友^①认为是疯子的人,尽管并非出于强制,即使在高龄,却宁愿投身于公共生活的狂风暴浪之中,而不愿意过一种退休的安静与闲散的、完全幸福的生活。我不用提很多人,他们多到数不清,他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共和国的救星;由于他们的事迹离开现一代人的记忆尚不算远,我就不打算说出他们的姓名了,免得有人埋怨没有提到他,或者没有提到他家庭中某位成员。我只满足于声称:自然已经给人类植入了对于品德的如此强烈的需求,植入了对维护公共安全的如此强烈的愿望,这种需求和愿望超过了一切来自欢乐与闲散的诱惑。

- 2 二、但是,就如同一种技艺一样,除非你运用它,否则不足以拥有它。尽管它确实是一种技艺,即使你从来没有使用过,只要你了解它,你仍然可以拥有它,但是,品德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对它的使用;而对它最高贵的使用便是治理国家,是把那些哲学家在其各自角落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耳朵所灌输的那些东西变为现实,而不是变为语词。因为哲学家阐发的原则,无一——至少,那些正义与荣耀原则——不曾为那些为国家起草法典的人们发现过并确立起来了。我们从哪里获得了责任感?我们又是从谁那里获得宗教的种种原则?从哪里出现了万民法(*law of nations*)甚或那些我们称之为“市民的”(civil)的法律?^②从哪里有了正义、荣誉、公平交易?

① 伊壁鸠鲁派,他们的理想是没有痛苦的安宁生活,这使得他们对参与政治不屑一顾。

② *ius gentium* (万民法)是对一切民族都适用的法律;*ius civile* 是罗马的私法。

从哪里有了体面、自律、畏惧不光彩、渴望赞扬与荣誉？从哪里有了对困苦与危险的忍耐？我说，都是来自这些人，当通过一个训练体制来灌输这些东西时，他们或者通过风俗来认可或者通过成文³法来实施这些东西。色诺克拉底，最卓越的哲学家之一，当有人问他他的学生学了些什么时，据说他的回答是：“依据法律对他们的要求，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因此，依据行政权威以及法律施加的惩罚而迫使所有他人服从法规（即使哲学家也感到这些法律告诫的正确性不令人信服）的公民，必须被认定为高于阐明这些原则的老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的话如此出众而为一个有很好法律和习惯的国家所用？事实上，正如我认为“那些伟大并居支配地位的城市”^①（恩尼乌斯这样称呼它们）在小村庄与要塞之上，所以，我相信统治这类城市的聪明的执政官及权威，即使在智慧上，都应当被认为是远远高于那些从来不参与政府事务的人。既然我们感觉到有一个巨大冲动促使我们去增加人类资源，既然我们渴望通过我们的思考和努力使人类的生活更为安全与富足，并且为大自然所驱使去实现这种愿望，那么，让我们坚持这一曾为所有杰出人物走过的进程，而对那些大声嚷嚷撤退——其目的只是想让超过他们的人退回来——的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三、和他们对这些论证的第一个反驳一样有根据且明显有⁴理，那些攻击这些论证的人又强辩说，为保卫国家而必须履行的劳作太严酷了。对一个小心而勤奋的人来说，这些事实上只是一个微小的障碍，而且是只配藐视的障碍，他不仅在上述时刻应该如

^① 可能引自恩尼乌斯的《编年史》。

此,就是在那些并不大重要的事情上亦该如此,例如在他的研究中,或者职责中,或者甚至在他的商业事务中。当然,他们也会在生命受威胁时叫喊危险,当面对勇敢者时会表现出不光彩的对死亡的畏惧;可是,这样的人习惯于视生命在自然进程和年老中消散是更大的不幸,还不如有机会为他们的祖国捐躯,这比其他情况更好。因为不管怎样,生命总要还给自然的。然而,对于这一点,反对者话多了起来,他们设想种种理由,口若悬河,不断地指出杰出人物之不幸以及他们在其不知报恩的同胞公民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对于这一点,他们提出了史例,首先是希腊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例证——米太亚德的故事,他是击败与征服波斯人的将领,他在其光荣取胜的战争前线所受的伤尚未痊愈,却已被他的同胞公民投入了铁锁链之中,并就在这些人的手中失去了连敌人的武器也未能伤害的生命;还有地米斯托克利,当他因恐怖而被迫离开他曾从敌人手中解放的国度时,他并不是在为他的勇武而拯救的希腊港口避难,而是在他曾使之臣服的最蛮荒的土地上。雅典人反复无常地并残酷地对待其最卓越的公民的例子确实不少。他们说,这种罪恶出自并遍布希腊,如今甚至在我们强大的共和国也泛滥起来了。因为我们记得对卡米卢斯的放逐,记得阿哈拉所忍受的耻辱,记得对奈西卡的仇恨,记得莱奈斯的被放逐,记得对奥庇米乌斯的定罪,记得梅特卢斯的外逃,记得降于盖尤斯·马略的痛苦灾难,以及记得此后不久,很多杰出人物的被害与毁灭。^① 实际上他

^① 关于这些人物的不幸,见本书索引。最后一句话显然指的是苏拉于公元前81年被剥夺公民权。

们现在也纳入了我的名字,推想起来,因为他们认为正是由于我的建议和我的冒险,他们才得以保持了安宁的生活,他们以更大的仁爱更为激烈地抱怨我所受到的待遇。可是,我很难说为什么、什么时候这些人会仅仅为取得知识而漂洋过海并访问别的国家;^① [他们应当想到我们会因考虑到这些危险而不再从事非常重要的保卫我们国土的任务。因为,如果哲学家因为漫游的危险而得到其中的知识回报,那么政治家更应在他们同胞公民的感谢中获得更多的报答。]

四、由于我遭受到的一切,很少有人曾想像过,]当我从执政官职位退休而在一次民众集会上宣誓,罗马人民也同样宣誓时, [只是由于我独自努力的结果,]共和国是安全的,^② 由此,我得到了充分回报,尽管有对我的不公正及其引起的一切不安与苦恼。然而,我的不幸给我带来的更多是荣誉而不是麻烦,更多是光荣而不是苦恼,从善良公民们对我深情期望中我感受到的快乐,^③ 要大于奸诈之徒的洋洋得意给我带来的痛苦。不过,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假如事情发展是另一种情况,我又怎能埋怨? 因为,对于在我的重要服务之后而落在我身上的种种不幸,我都并非毫无预感,而且也不比我的预测更为严重。这就是我的天性,由于我自童年起就从研究学问中享受到多种快乐,一方面,我不可能,从一种安静无为的生活中获得较他人为多的收益,或者,另一方面,如果万一有什么灾难落在我们大家头上,我也不会因这一共同的灾难而

① 这里大约遗失了 15 行;括号中是猜测性的复原。

② 参见 Cicero, *In Pisonem* III, 6。

③ 在此,西塞罗说的是他的被流放(公元前 58 年 3 月至公元前 57 年 8 月)。

受难更多。尽管如此,我还将毫不犹豫地献身于最凶猛的暴风雨,而且,我甚至还要说,我可以面对雷电的轰击,为了我的同胞公民的安全,我愿意以个人的危险换取所有人的安宁生活。老实说,我们的祖国生养教育我们,并非不期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给予某些积极的回报;祖国并非仅仅为了使我们便利,给我们的闲适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为我们的安宁提供一个安静的隐居地;相反,她给予了我们这些有利条件,她就可以在她需要时使用我们的勇敢和才华中的更大和更重要的部分,留给我们个人使用的,仅仅是她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而可能留下来的那些。^①

9 五、此外,我们肯定不应该听信一些人找到的其他借口,即他们可以更自由地享用安宁的生活。例如,他们说参与政治的人最没价值,同这些人相比人就降格了,如果和他们冲突,特别是当暴民被激发起来之后,将是一种糟糕和危险的事。因此,他们坚持,一个聪明人不要试图驾驭他们,因为他无法限制一大群疯狂与野性暴躁的牲畜;对一个自由人来说也不适合与那些卑劣及狡猾的人争辩,忍受漫骂污辱,或者让自己受到对于智者来说无法忍受的不公对待,在那些善良、勇敢、思想高尚的人看来,似乎参与公共生活的任何动机都要比决心不受小人统治、不让小人摧毁共和国更为崇高,当这样看问题时,哲学家自身,哪怕他们可能有意帮助,也无法做到。

六、当他们说除非有某种紧急情况迫使智者参加,他们不会
10 参与公共事务,在这个世界上,谁能够赞同他们作出的这唯一例外

① 参见 Plato, *Crito* 51 A—C。

呢？似乎有什么人可能遇到任何比我所遇到的更为紧急的情况；如果当时我不是执政官，在这种危机中，我又能做些什么呢？若非我自小就拥有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使我尽管出身于骑士，却得以获得国家的最高职务，我又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执政官呢？所以，很清楚，为国服务的机会——不论这种服务有多大的危险——并不是突然来临的，或者，当我们希望为国服务时，如果我们不是处于这样的职位，我们就不可能采取行动。我一向认为，在有学问的人的教诲中，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否认自己有大海风平浪静时掌舵的能力，说自己从未学过、也不想了解这种技能，可是他们同时向我们保证说，惊涛拍天时，他们就会出来掌舵。他们已习惯于公开宣称，甚至以此自夸，说他们既未学过，也未教过任何有关国家原则的内容，无论是建立国家还是保卫国家，他们认为这种知识对博学智者不合适，最好是留给那些受国家公务训练出来的人们。因此，他们承诺在国家为紧急情况所迫时帮助国家，而在没有危机威胁国家时他们并不懂得如何统治国家，尽管这一任务比起前一任务来说要容易的多，这又怎么合乎情理呢？按一般道理，聪明人确实不愿降低其高尚位置而从事治国术，但是如果情况迫使他承担，他也不拒绝这种责任；即使真的如此，我仍然认为他完全不应轻视政治这门科学，因为他的义务就是事先获得未来什么时候对他来说也许是必须使用的一切知识。

七、对这些问题，我讨论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因为在这本书中¹²我计划讨论国家并进行了这一讨论；因此，为了这个讨论不至于没有价值，我首先就必须清扫一切在参与国家事务上迟疑的理由。但是，如果还有什么人为哲学家的权威所左右，那么就让他再聆听

并关注一下那些在博学者中具有最高权威与声望的人物吧；这些人，即使他们并未亲自治理过国家，但是由于他们在许多研究和著作中都讨论过国家，我认为他们在国家中已经履行了他们自己的某些职能。事实上，我还注意到希腊人称之为“智者”的七个人，都曾在治国事务中承担过重要角色。的确，就职业的品德来看，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行当比建立新国家或维护那些现存国家更接近于诸神的庄严职责了。

- 13 八、因此，既然这是我的好运，通过对共和国的实际治理，去成就某种值得为人们记忆的事业，并且通过实践和我热衷于学习和教学的缘故，我也获得了一些确立政治原则的技艺，[我认为我本人并非适宜承担我现在所承担的工作；事实是，在一个人身上汇集了这些成就，这即使在那些被认为是治国]权威[的人当中也是很少见的]，因为虽然过去时代里某些人在理论阐述中表现出技巧高超，可是人们发现他们在实践中却一无建树，另外一些人，他们在行动上很出色，但在理论阐述上却很笨拙。确实，我将要陈述的原则并非全新，也非我一人所独见，不过，我的意图在于追忆我们共和国中一些最杰出、最聪明的人物在某个时期曾进行过的讨论。当你年轻的时候，普布利乌斯·普提利乌斯·鲁夫斯曾报告你我——当时我们正一起在士麦那度日；我认为在那次讨论中，对这全部论题的逻辑分析会有巨大贡献的论点很少被忽略。

- 14 九、当图第塔努斯及阿奎利乌斯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① 保

① 即公元前 129 年。

罗的儿子,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① 决定在他乡村住所度过拉丁节日,^② 有好几位他最密切的友人表示他们有意在那段期间去拜访他。节日那天早晨,他的侄子昆图斯·图伯罗比其他人来得更早。西庇阿热烈欢迎他,因为他确实很高兴见到他,然后问到:图伯罗,为什么你来得这么早?这几天假期肯定给你提供一次极好的机会让你从事文学研究。

图伯罗:我的书本在任何时候都在家等着我,因为它们从来不忙碌,可是,你有空闲,特别是在这个政治不安定的时候,那倒是一个很大的荣幸。

西庇阿:是的,你发现我有空闲,只是我人闲心不闲。

图伯罗:不过,你有责任松弛一下自己。我们很多人都决定并且准备好了,要和你一起度过这段闲暇,如果你方便的话。

西庇阿: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至少有机会对一些有益的问题进行讨论。

十、图伯罗:真不错,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既然你很像 15
是给了我一个邀请,并且鼓励我对你抱有希望,那么在其他人尚未来到之前,我们是否可以探讨关于第二个太阳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已经报告了元老院。因为那些声称看到两个太阳的人既不是少数也并非不可信赖,因此,我们一定要解释这个事实而不是不相信这件事。

西庇阿:要是我们的朋友帕奈提奥斯和我们在一起就好了!

① 即普布利乌斯·科内利乌斯·小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阿非利加努斯。

② 这些拉丁城市的古代节日似乎一般有三、四天;欢庆时间是由执政官们的宣告规定的。

对这种天体现象以及其他问题作仔细观察是他的习惯。可是,图伯罗,坦率地对你说,我的意见是,我完全不赞成我们的朋友对这类事情的习惯:在研究那些依靠推测对其性质不能得出些许真实结果的事物时,他说得如此肯定以致于使人认为他可以亲眼看到,或者亲手摸到它们。我总觉得苏格拉底表现了更大的智慧——他对这类事物不表示任何兴趣,并认为这类自然现象的难题,或者是人类的理解力难以领会,或者是对人类生活没有丝毫紧要。^①

16 图伯罗: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向的传说都是,苏格拉底拒绝沉溺于任何这种性质的讨论,他限定自己只研究人类生活和人类道德。关于苏格拉底的事,除了柏拉图的著作,我们还有什么更值得信赖的权威可以引证呢?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在苏格拉底讨论道德、品德甚至国家的许多章节中,苏格拉底都说得很清楚,他渴望依照毕达哥拉斯的方法,把这些论题的讨论同关于数学、几何以及和谐的考虑结合起来。

西庇阿:图伯罗,你所说的都很对;不过我想你听说过这一点: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出外旅行,为了研究,首先到了埃及,然后到了意大利和西西里,^②其用意就是要使自己熟悉毕达哥拉斯的一些发现;你可能也听说,他与塔兰托的阿契塔、洛克里的提麦奥斯相伴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还得到了菲洛劳斯的笔记。由于毕达哥拉斯当时在该国声望很高,柏拉图便全身心关注这位大师的门徒和学说。并且,虽然他对苏格拉底有一种独特的热爱并希

^① 见 Xenophon, *Memorabilia* I, 1, 11—12; I, 1, 16; IV, 7, 2—4.

^② 关于柏拉图的旅行,这段文字是我们现有的最早的可信资料。现在人们一般接受柏拉图访问西西里是一个事实,但其埃及之行被认为非常可疑。

望将一切荣誉都归功于苏格拉底,他却因此在如此之多的知识领域中把苏格拉底论证上的生动与精妙同毕达哥拉斯学识上的暧昧与沉闷结合在一起。

十一、说完这之后,西庇阿发现卢修斯·弗里乌斯·菲卢斯未加通告就进来了;向他热情问候之后,西庇阿牵着菲卢斯的手带他到他自己的躺椅坐下。这时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也来了(他后来把谈话告诉了我们),他在接受了西庇阿的欢迎之后,被安排坐在图伯罗身旁。

菲卢斯:你们在谈论什么?我希望我们的到来没有打断你们的谈话。

西庇阿:当然没有;刚才图伯罗开始探讨的问题,属于你一向有兴趣研究的那类题目。至于我们的朋友鲁提利乌斯,他有时也常常和我谈论这种论题,甚至就在努曼提亚城内。

菲卢斯:具体题目是什么?

西庇阿:两个太阳,菲卢斯,我很希望听听你对它们的看法。

十二、他刚说完此话,一个仆人通报说莱利乌斯已经离开他的住所,正在来路上。于是,西庇阿穿好衣服和靴子,离开卧室,在门廊间踱了一会儿步。莱利乌斯来到时,西庇阿问候了莱利乌斯以及同来的斯普里乌斯·穆米乌斯(西庇阿很喜欢他)、盖尤斯·范尼乌斯和莱利乌斯的女婿昆图斯·斯凯沃拉,他们都是受过出色教育的青年,现在已到了担任会计官的恰当年龄。^①在所有这些招呼问候之后,西庇阿回到门廊附近,他让莱利乌斯坐在中央,因为

^① 大约 30 岁。

这几乎是他们友谊的一个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在战场上莱利乌斯把西庇阿当作神,因为西庇阿在战争中有辉煌功绩;而在家时,由于莱利乌斯的高龄,西庇阿把他当作父亲来尊重。他们来回走着谈了一阵,对他们的到来感到非常快乐的西庇阿认为在这冬天最好是让他们坐在草坪上阳光最充足的地方。他们都很愿意。就在这时,曼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来了,这是一位思维敏捷的朋友,和他们都很合得来并为他们喜爱。接受了西庇阿和其他人的问候之后,马尼利乌斯靠着莱利乌斯坐下了。

- 19 十三、菲卢斯:这些朋友来了,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改变谈话的主题,但我认为,我们必须更为仔细地讨论,务必使得我们的发言值得他们关注。

莱利乌斯:你们在讨论什么?什么样的谈话被我们打断了?

菲卢斯:西庇阿刚才问我对那一般为人们所承认的事实,就是人们看到两个太阳,有什么看法。

莱利乌斯:菲卢斯,你认为我们对于那些与我们的家庭和国家有关的问题已经获得了完整的知识了吗?——因为我们现在正要研究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菲卢斯:难道你认为我们了解家里已经或正在发生了什么,这对我们的家不重要吗?这个家并不是为我们建筑的城墙所封闭的,而是整个宇宙,是诸神给予我们特权与他们分享的家园和祖国。这肯定很重要,特别是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无知,我们就一定会对其他许多重要的东西无知。除此以外,仅仅了解有关自然的事实并进行调查,至少也会给我最大的愉悦。莱利乌斯,你肯定也是这样,所有那些渴望智慧的人也必定如此。

莱利乌斯：我并不反对这一论题，特别今天是一个假日。可是，我们是否就要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某些讨论，或者，我们来得已太迟了？

菲卢斯：我们还没有讨论呢，而且，既然我们尚未开始，我很高兴请你先谈，莱利乌斯，你可能会告诉我们你对这个论题的看法。

莱利乌斯：恰恰相反，还是让我们听听你的，除非马尼利乌斯也许会认为，应该发布一项临时命令，使这两个太阳妥协，这样一来“它们将依照双方共同占有天空的方式来占有天空。”

马尼利乌斯：莱利乌斯，你是否还在嘲笑这种技艺？^①而你本人是非常精通此道的，没有这种技艺就没有人能够知道什么东西属于他和不属于他。不过，我们可以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现在还是让我们听听菲卢斯的话，我知道，已经有人就一些重要论题咨询过他，这些论题比问及普布利乌斯·穆西乌斯和我的意见的那些论题更为重要。

十四、菲卢斯：我没有任何新东西对你说，也没有什么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或我自己发现的。我想起盖尤斯·苏尔皮西乌斯·加卢斯生活中的一次偶然事件，你们知道他是一位最博学的人：有一次，有人告诉他一个与此类似的现象，当时他刚巧在马库斯·马塞卢斯——他们当时同任执政官^②——家中，盖尤斯吩咐把天体仪拿出来，这是马塞卢斯的祖父在占领叙拉古——一个十分富有和美丽的城市——时^③从那里带回来的，而他没有要巨大战利品仓

① 即法律顾问(*iuris consultus*)这个行当。

② 公元前 166 年。

③ 公元前 212 年。

库中的其他什么东西。虽然由于阿基米德的声望我曾经听到人们经常提及这个天体仪,可是当我真正看到它时,我却不特别崇拜它;因为另外还有一个天体仪,也是阿基米德制造的,被同一位马塞卢斯放置在道德神殿,这个天体仪更加美丽,在人们中间也更广为所知。^①可是,当加卢斯开始对此仪器作出一个非常博学的说明时,我得出结论,这位著名的西西里人所具有的巨大天才要超过人们想像一个人可能具有的天才。因为加卢斯告诉我们,其他种类的天体仪都是实心的,内里没有空间,那是非常早期的发明,第一个那种类型的天体仪是米利都的泰勒斯建造的,后来克尼多斯的欧多克索斯(传说是柏拉图的弟子)刻上了天空中恒定的星座和星辰。他还说,多年之后,阿腊图斯沿用了欧多克索斯的全盘设计安排,他没有任何天文知识,仅靠他可观的诗才,用诗句把它描述出来。^②不过,他说,这个比较新的天体仪上描刻了太阳、月亮以及那五颗人们称为漫游者或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徘徊者的星星^③的运行轨迹,这比之那种实心的天体仪包容更多;他说,阿基米德的这一发明特别值得钦佩,因为他想出一种方法,通过一个转动天体仪的装置,可以准确地再现各种方向不同、速度不同的运行轨迹。于是当加卢斯转动天体仪时,果然如此,在那个的铜质装置上,月亮位于太阳之后的旋转次数总是与人们所认可的天空中月亮在太阳之后的天数相同。因此,日食在此天体仪上总是像事实那样发

① 见 Cicero, *Tusc. Disp.* I, 63; Ovid, *Fasti* VI, 277。

② 这里所说的诗是 *Phaenomena*, 西塞罗青年时代将之译为拉丁文。现尚存这一译本的残篇。

③ 这五颗星是:土星、木星、火星、水星和金星。